

〈論 説〉

当代中国乡村儒学的诉求、收获与瓶颈

——以山东乡村儒学为例

庞 景 超¹

摘要：当代中国的“乡村儒学”，是指从2013年初至今，一批有文化情怀和奉献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山东乡村推广儒学的活动，也是指一场改善乡村文化现状、再造乡土文明的当代文化实践，同时也是指由此发展出的一种民间儒学实践形态。乡村儒学是在城市化进程冲击乡村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基本理念是以儒家文化的普及来带动乡村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的重建，其初步目标是改善家庭伦理，重建人伦精神，其长远目标是重建儒家教化体系，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乡村儒学具有双重理论诉求，既是为乡村建设注入儒家力量，也是为儒学自身发展探索出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乡村儒学取得了初步成效，改善了家庭伦理和社会风气，也因此得到山东各级政府的支持与响应，同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话题，并初步证明了儒家道德思想在今天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但同时，它也面临定位不清以及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瓶颈，乡村儒学在未来必须突破这些瓶颈，才能持续、深入发展。

关键词：乡村儒学；理论诉求；收获；瓶颈

現代中国農村儒学の訴求、収穫とネック

——山東農村儒学を例にして

要旨：現代中国農村儒学とは2013年から今に至るまで、文化に心持ちと奉仕精神がある人文知識人たちが山東省農村で儒学を広げる為に活動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も農村の文化現状、郷土文明の再構を実践してい

る。同時にこれがきっかけで民間儒学の実践形態が表れた。農村儒学は都市化の過程で農村社会の背景の下で発生した。基本理念としては儒学文化に普及しつつあり、農村の人倫秩序と文化生態の再構を促進する。最初の目標は家庭倫理を改善すること、人倫精神を再構することである。長期的な目標は儒家の教化を再構するシステムになり、郷土現状の管理を改善する。農村儒学は二重理論を主張したいが、農村の建設に儒学者の力を借りることにより、儒学自身もその後の活路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4年を経て、農村儒学の最初の段階の効き目を取得した。家庭倫理と社会気風を改善したため、山東省政府から支持され、それと共に学術の上でホットな話題になっていた。儒教道徳思想は今日も相変わらず効用を発揮することを初歩的に証明した。しかし、現実には直面して位置づけがはっきりわからない。経費をはじめ、教師の資格を備えた人が少ない、教材など多く苦境に陥った。農村儒学はこれらの苦境を乗り越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乗り越えたら、持続的に良い発展をす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キーワード：農村儒学、理論訴求、収獲、ネック

The Appeal, Harvest and Bottleneck of Rura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 Taking Rural Confucian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 The rura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ers to a group of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who have cultural feelings and dedication to promote Confucian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13. Besides, it also refers to a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rebuilding local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it also refers to a form of folk Confucian practice. The rural Confucianism arises from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basic idea is to popularize the Confucian culture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thical order and cultural ecology.

Its primary goal is to improve the family ethics and reconstruct the human spirit, and its long-term goal is to rebuild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ituation. The rural Confucianism has dual theoretical appeal. It not only injects Confucian power into rur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explores the outle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tself. After fou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improved the family ethics and social atmosphere, and also got support and response from the Shandong government. Moreover it has also become an academic hot topic,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fucian moral thought in today can still play a rol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aces many bottleneck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fund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refore it must break through these bottlenecks in order to continue and develop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ural Confucianism, Theoretical appeal, Harvest, Bottleneck

一、引言

自从2015年聆听了赵法生先生一场题为《乡村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的讲座之后，笔者就对当代中国的“乡村儒学”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一直持续追踪其发展，试图对其产生的当代背景、基本理念、内在逻辑、发展状况、取得的成效、发展瓶颈、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梳理，从儒学、农村社会学等学术视角对其展开研究，理解和说明当代中国“乡村儒学”的内在机制及其在当代社会开展的意义。

儒家文化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干，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支撑与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使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儒家的精神烙印。传统乡村²曾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的蓄水池，儒家思想也一直是传统乡村文明的道德根基，但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政治运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维系乡村伦理的教化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借鉴传统教化形式，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乡村文明新风，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分别是儒家思想的两大领域，暂且不说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为儒家理论底色的道德思想对于化解今日中国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是否还有作用？在强调权利、法治的当代，儒家的道德教化是否还有生命力？如何在乡村社会发挥儒家擅长的道德教化作用？日趋没落的乡村文明是否能从儒学中获得焕发发生机的可能？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乡村儒学是如何推动乡土文明重建的？对于这些问题，从对当代中国乡村儒学的研究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二、乡村儒学的理论诉求

就儒学的发源和普及而言，在传统社会中儒学的最基本形态就是乡村儒学，那么在当代中国“乡村儒学”又指的是什么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乡村儒学”在广义上是对一切在乡村传播儒学、实践儒学——如儒学讲堂、孔子学堂、道德讲堂、诵读经典、普及国学、礼乐教化、道德实践等儒家文化现象的总括。在狭义上，指的是从2013年初至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在山东乡村推广儒学的活动，他们针对目前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各地乡村开设儒学讲堂，建立了一套初步的儒家教化体系，探索用儒家道德思想的精髓重塑乡村文明。在山东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乡村儒学讲堂还在山东省其他市县试点运行。浓厚的文化和学习氛围渐渐取代了过去的歪风陋习，使当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呈现出独特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这次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的尝试，因其具有实验性质，所以也被称为“乡村儒学实验”。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教育活动，“乡村儒学”指的是一场以改善乡村文化现状、提升村民道德水平，试图重现温情乡村、再造乡土文明的当代文化实践，是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文化情怀、奉献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新方式。《荀子·儒效》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乡村儒学力图发挥儒学教化人心、移风易俗的功能，与二十世纪

初的“乡村建设运动”³相比，当代乡村儒学无论是在时代背景、性质目标，还是在理论形态、具体方式上，都已大不相同。正如柳河东指出，“从目的上来看，民国乡村建设实质上是文化教育为先导，通过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以达救亡图存为目的，更多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而今天的儒学下乡工程则是以复兴儒学、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素养为主要目的社会文教活动。”⁴尽管如今的乡村儒学与当年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以注重儒家文化复兴和重建为特色的“乡村建设型”实践一脉相承，但由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乡村儒学已不可能复制当年的下乡途径，无疑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作为一种儒学普及形式，“乡村儒学”指的是自2013年从山东兴起之后，逐渐发展而受到学界关注的一种儒学实践形态。有别于“学术儒学”和“应用儒学”，“乡村儒学”从属于蓬勃发展的“民间儒学”⁵。民间儒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之一⁶。就儒学的本然面目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民间生活方式，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之道和文化存在。作为民间儒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村儒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植根于乡土、服务于乡民的儒学实践形态，是儒学重新融入当代社会、作用于日常生活的积极探索，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为人处世之道在村民的心中扎根，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村民家，成为村民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目标。“乡村儒学”被认为开辟了“儒学新阶段”⁷，是当代儒学复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关于“乡村儒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不少研究者指出，这要放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尤其是要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这个角度去理解。如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德教授认为，如果完全基于工业文明的标准，那么乡村就是一块应该消亡的落后区域，但是，从生态文明的标准看，乡土文明却未必那么落后，它反而有着不容忽视的合理性和先进性。⁸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对中国乡土文明冲击都比较大，但这种冲击仍然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因为中国乡土文明的根基——

乡村农业并未遭到根本破坏。而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城镇化、工业化、商业化为主要方向的工业文明却带有明显的颠覆性冲击。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张玉林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拔根时代”揭示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窘境。所谓“拔根”，一是指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指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乡村儒学的意义在于固本培元，在于收心，让人们重新认识家庭和乡村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力量对家庭和乡村的解构，让在个体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重新体悟到维持家庭的圆满和乡村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¹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研究员，作为“山东乡村儒学实验”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也认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造成目前乡村文化沙漠化的原因。¹¹

在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城市化进程冲击乡村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在逐渐边缘化、空心化，面临这样一些严峻问题。第一，自然村落加速消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约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¹²第二，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打工浪潮兴起后，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农村的主体人群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其社会基础正在逐步被抽空；¹³第三，乡村教育弱化。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范围内撤并乡村小学，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¹⁴第四，乡村信仰缺失带来的家庭伦理、公共道德状况恶化。近代以来维系家庭组织的一些基本人伦价值陆续被解构，使家庭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尤其是孝道方面。乡村老人自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主要原因在于老无所养，老无尊严；¹⁵第五，传统优良礼乐教化断失，传统乡土文化活动逐渐消失。许多宗祠、乡贤祠、庙宇等传统教化道场遭到严重毁坏，乡贤、宗长教化体系不存，传统的社戏、庙会、民俗活动等文化生活形态正逐渐消逝；¹⁶第六，乡村的传统文化体系被摧毁之后，外来宗教及其异化变种在乡村快速传播。由于现在农村基本上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弱妇幼，宗教的传播极易发生异化而演变为邪

教；¹⁷第七，村民社会责任感弱化。一方面，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弱化，农民个体对集体组织的生存依赖相对减少，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功能日渐松弛。另一方面，农民自身固有的小农意识和社会发展焕发出来的公民权利意识，促成了当下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诉求。¹⁸

总之，处于全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靠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都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乡村文明的重建也存在许多政策、制度、法规所不可触及的道德真空地带。严峻的现实终于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新农村建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塑乡村的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才是完成乡村现代转型的必要前提，而儒家的教化机制和教化体系可以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面前，乡村儒学应运而生。

从乡村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仅就山东而言，乡村儒学最初源于学者们自发的行为，在政府介入之后，则演化出另外一套官方的乡村儒学推广模式。因此，可以总结出目前山东乡村儒学大体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尼山书院学者们为代表的学者主导型模式，由学者主持，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开展工作，并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其基本特征是民办公助；第二种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比如山东省曲阜市推出“百姓儒学”工程，为下辖的405个村庄配备儒学讲师，推动儒学进入乡村；第三种是民间自发型模式，场地、讲师、教学与资金完全由民办。狭义上的“乡村儒学”正是第一种由学者们主导推动的模式，这也是乡村儒学的初衷，因此成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乡村儒学在理论上并不复杂，其基本理念是“以乡村儒家文化的重建来带动乡土文明的重建，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培育民众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重建乡村的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¹⁹，其逻辑起点是发挥儒家修身思想、教化思想的作用，认为这些是发乎人心合乎人性的，是儒家仍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它主张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尤其是孝道重建做起，其初步目标是在乡村重拾道德底线，重建人伦精神²⁰，为留守农村的妇女老人儿童提供急需的伦理文化服务，重建家庭伦理²¹，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为乡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伦道德基础²²。

之所以选择孝道作为突破口，是因为赵法生认为，今日的乡村对于儒家文化的强烈需求首先体现在家庭和谐和子女教育上，最需要的是孝道观念、五伦观念、修身思想和礼义廉耻思想。乡土文明的重建必须从孝悌之道这个根本处入手，因为孝悌为仁之本，而家庭又是乡村之本。²³当前乡村家庭伦理失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孝道缺失，打骂老人、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大量存在，加上目前社会还无法给乡村老人提供完善的养老系统和社会保障，在这种现状下，他们的养老和保障全凭儿女的孝心，如果儿女不孝，他们就会陷入老无所依的境地。²⁴所以在乡村讲孝道最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最能打动人心。

同时他又强调，讲课只是乡村儒学的基础部分，乡村儒学是一个包括理念、课程、活动、践行在内的完整的教化系统。它力图将孔子的修身做人思想变成一系列课程，借讲课变成村民的人生信念，再通过一系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渗透进村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所传达给村民的，不仅是一些道德说教，更是一种人生信仰，以此解决乡村的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问题。²⁵

所以，乡村儒学主张首先从孝道入手，通过讲读《弟子规》等儒家启蒙读物，激动人们本性中孝亲的自然情感，以培育孝亲观念为起点，维系家庭人伦，构建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秩序；然后推而广之，放大人性善的一面，将人的高贵性凸显出来，将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做人的基本规范传承下去，逐步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乡村的伦理规范，培育淳朴敦厚的民风；同时试图纠正人们生活中种种具体的失当行为，从最基本的生活礼仪教起，使长幼有序，夫妇有礼，还将婚丧嫁娶的礼仪重新规范起来，辅以儒家教化歌曲，在“道之以德”的同时“齐之以礼”，塑造礼乐人生，还原礼乐文明的本然面目；还鼓励听过课的老人回家后给孩子们多讲讲道理，规劝前来听课的年轻人从改变一个观念做起，引导参与的小朋友回家每天为长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让人们都参与到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营造与人为善的氛围。简言之，就是发挥儒家教化的基本功能：教国民、兴礼仪、厚人伦、美风俗。

乡村儒学的长远目标则是重建儒家教化体系，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扩展

到社会伦理，并以此为基础改善乡村治理状况，力图将儒家教化体系的重建与解决乡村治理的当下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目前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之路。赵法生认为，“乡土文明的重建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儒学必须要与现代乡村的生活相适应。为此，儒学在乡村的信仰、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都需要转化。儒学在乡村的重建和现代转化将为乡村文明提供信仰和价值的基础。其次，乡村需要重建治理体制和治理秩序，此一体制当能遵循民主法治的原则，在继承传统乡村自治精神的基础上，实现治理方式的现代转化。”²⁶

从乡村的信仰状况来看，通过上述儒家教化的初步实施，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有可能重新成为乡民的人生信仰。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为当代中国人设计一个统一的信仰，儒家所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只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选项。而从乡村儒学的组织依托看，主要是家庭和乡约，重建家庭伦理以解决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秩序，通过建立“乡约”在村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一套道德规范，以弥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不足，从而构建村落共同体的秩序与风尚。

赵法生认为，乡村儒学将来要达到的目标是要返本开新，最终实现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三堂”分别是学堂、祠堂、道堂，乡村作为传统中国的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因为有这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而现代乡村儒学讲堂，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承担起相类似的功能。²⁷他希望借助乡村儒学实现这样一种理想乡村的设计——理想乡村首先应该是“富而好礼”的，在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温文有礼的状态；其次应该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们得到很好的教育，整个社会是和谐的、诚信的；再次应该是民主法治的，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人格教养与现代法治结合起来。²⁸

在梳理这些观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乡村儒学的理论诉求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了乡村文明的重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儒学自身的发展。正如前文对“乡村儒学”进行的界定，它既是一种以儒家文化再造乡土文明的文化实践，又是儒学在当代复兴的新型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从前者来看，不管是乡村儒学的初步目标——重拾道德底线，重建人伦精神，还是长远目标——重建儒家教化体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都是对这一理论诉求的表达。而从后者来看，乡村儒学在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在为自身发展探索道路，与其说是乡民借助儒学实现自身道德水平的提升，不如说儒学借助乡民来实现自身的延续。

并且，相较而言，第二重理论诉求表现得更加强烈。正是因为如此，赵法生强调，乡村儒学绝对不是单纯的复古，同时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搞儒学教化一定是和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形态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儒学。²⁹而“乡村儒学”另一位重要发起人颜炳罡教授则形象地将乡村儒学形容为“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³⁰，认为通过乡村儒学，可以实现儒学由小众、精英向大众、百姓的转化。乡村儒学就是让儒学由少数人文学者的研究对象转化为百姓生活的向导，由精英知识分子谋生的手段、学术价值的实现方式转化为百姓人伦日用之道。乡村儒学的目的就是让儒学生活化、实践化、草根化，说到底是为儒学的世代传承发展探索新路径，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一种新模式，一种新常态。³¹

总之，就其理论诉求而言，重建“乡村儒学”，既是为乡村建设注入儒家文化力量，也是为儒学自身发展探索出路。

三、乡村儒学的实践效果

要说清楚乡村儒学的缘起，就要从“尼山圣源书院”说起。书院由海内外学界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发起，山东各级政府支持建立。2008年10月，在距离孔子诞生地夫子洞村不足八百米的泗水县北东野村，书院正式挂牌成立。书院实行“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体制，其中“民办公助”也是继承传统书院的办学方针。³²书院学者们推广乡村儒学的活动源于一场调研。2012年末，书院的学者在对孔子诞生地夫子洞附近的泗水县的北东野村、曲阜市的夫子洞村和周庄三个村子调研时发现，圣人故里周边的文化状况存在三方面问题：乡村文化的沙漠化，比较严重的家庭伦理问

题，外来宗教在乡村快速传播。这些问题表明，乡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乡村文化与乡土文明需要输血式急救，需要那些关心乡村的城里人返回来重建乡土文明。他们认为，光建书院还不够，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历史典籍、象牙塔里和学术研讨中，必须以书院为平台，把儒学经典、优秀传统文化送到村里，种到人们心里，于是在村里开办儒学讲堂、重建乡村儒学的想法出现了。于是书院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和志愿者开始在尼山周围下乡讲授儒学。

2013年1月16日，以尼山圣源书院为依托，圣水峪镇建立了第一个乡村儒学讲堂，主要面向北东野村村民，以此揭开了乡村儒学实验的序幕。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乡村儒学讲堂不断显现出成效，也拓展到济宁、聊城、潍坊等地。2014年6月21日，由光明日报社、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在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召开，探讨因乡村儒学影响扩大而形成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到2015年7月，山东省已有9个地市开展乡村儒学讲堂，包括济宁、济南、潍坊、临沂、菏泽、聊城、日照等，覆盖大半个山东。2016年，乡村儒学的发展尤其明显，不但在山东省继续推广，也波及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目前山东省正进一步完善“图书馆+书院”模式，加快城乡儒学讲堂建设。截至2017年2月，山东省内公共图书馆已全部建成尼山书院，乡村（社区）儒学讲堂达到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³³

由学者们主导推动的乡村儒学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据赵法生介绍，在这一维度上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³⁴：其一，建立了定期化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乡村儒学讲堂是给村民讲儒学的地方，也是村庄的公共文化场所。其二，形成了一支志愿讲师队伍。这些志愿者，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退休老师，也有在职老师，也有做企业的老板等等，都是无偿地尽义务来为村民讲课。其三，建立了一套乡村儒学的传播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课堂和课外两方面，课内课外、家内家外的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了乡村儒学传播体系的内容。这个传播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行孝道。不单是讲孝道，最重要的是要践行孝道，所以不断从村里找一些孝道的典型，

让他们介绍行孝的经验，来表彰先进，带动落后，还给前来听课的孩子布置孝道作业；第二，学经典。讲读的经典是浅显易懂的圣书、善书，圣书就是儒家经典，善书就是中国传统的劝善经典；第三，习礼乐。乡村儒学课堂从最基本的生活礼仪教起，每次上课之前，让孩子给在座的长辈鞠两个躬，然后所有人站起来给孔老夫子鞠四个躬，也请专家给老百姓演示和传授一些婚礼、冠礼、丧礼、成童礼、射礼等儒家礼仪，另外还组织孩子们组成小小国乐团，常常在课堂上为大家表演；第四，助社会。志愿者们时常到村民家里串门聊天，照顾困难老人的生活，救助失学儿童，从济南请来心内科的大夫给村民治疗三高、讲解防治三高的知识，长期资助一些困难家庭，逢年过节慰问困难家庭，建立“安怀基金”，发动大家募捐，让更多的老人孩子受益；第五，营氛围。在试点村子里，设立传统文化宣传栏，墙壁上书写儒家修身齐家格言，每天定时播放《弟子规》以及孝道歌曲，组织《弟子规》背诵比赛，组织评比活动投票评选孝亲媳妇、模范公婆、和谐家庭。还根据村民的要求，请县里的剧团来村里表演一些文化节目，尤其是一些孝道、传统文化、家庭伦理的节目；第六，立乡约。目前有些村子也有乡规民约，但多是硬性的具有法律法规性质的规定，没有心性的启发、人心的唤醒。儒家的乡约是建立在自我省察的基础上，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因此学者们选择一些村子做乡约试点，其内容主要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卫、持戒、权利等内容，将乡约变成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并选出德高望重的乡绅作为约长，来监督乡约的执行。

在推行了一年多之后，乡村儒学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试点乡村的人心和风俗都得到了积极的改善，具体表现在：

其一，乡村儒学讲堂显著改善了乡村孝道状况，孝道的正气树立起来了，打骂老人的风气被刹住，孝亲敬老的风气渐浓。到2013年年底，北东野村的村子里已经没有人敢公开不孝敬老人，有些原来非常不孝的人，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知道孝敬老人、赡养老人了。³⁵又比如在聊城市茌平县的韩屯镇，乡村儒学讲堂也让村里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兄弟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都变得融洽了。”³⁶

其二，乡村儒学讲堂带来变化不仅局限在个人私德的家风，更表现在社会公德的村风，试点的村子里都显示社会风气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比如北东野村，邻里关系更融洽了，酒后骂街的情况明显减少，小偷小摸的情况减少了，乱倒垃圾的风气被纠正了，干群关系有所改善，农网改造期间政府开展工作也更加顺利。³⁷官庄村村支书汤金金也目睹了同样的改变，据他介绍，乡村儒学开讲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原本逐渐变得冷漠而提防的邻里关系开始回暖，从老死不相往来变得互敬互爱。³⁸又如济南章丘的三德范村，最显著的变化是丧葬礼仪的改革，过去丧葬礼仪铺张浪费，人们迷信于大操大办，有时候光吃喝费用就达两万多元，整个过程要拖上三天左右。现在村民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接受厚养薄葬的理念，减少了程序，缩减了时间，既守住了传统，也更符合孝道真谛。³⁹再如聊城市茌平县的韩屯镇，传统文化的力量于无形之中改变着百姓的思想，原本远离市区、治安状况较差的韩屯镇在2013年实现了零上访，打架、赌博等治安案件数量也大幅下降。⁴⁰泗水县圣水峪镇镇党委负责人也介绍说，2014年，全镇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8%，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5%。如今，各村出口伤人、酗酒搓麻将、动手打架的人明显减少了。⁴¹

可见，乡村儒学确实产生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效用，除了记者的实地采访之外，也已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社会学研究方法，证实了乡村儒学的初步成效。⁴²关于乡村儒学取得成功的原因，已有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利用资源动员理论，分析了乡村儒学讲堂成功的原因，认为乡村儒学的内容契合当前政治机遇、采取了多样化的资源动员方式，并且以满足村民文化需求为目标、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才保证其取得初步成功。⁴³这种分析是合理的，但仍可以做更进一步、更切实的说明。

其一，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看，乡村儒学的成效与学者们采取的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是分不开的。“不讲道理讲故事”——把儒学“故事化”，寓理于事，才能通俗易懂，正如北东野村党支部书记庞德海总结的那样：“第一，它教人孝敬；第二，教人懂道理；第三，教人办好事儿，所以受欢迎。”⁴⁴；“不讲天边讲身边”——多举身边的例子，让人可信可感，

而从当地采集真实的事例，针砭刺恶，移风易俗，也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⁴⁵“不做老师做朋友”——放低身价，不把自己定位成传授知识的老师或全知全能者，而把自己当成农民的朋友，当成回家看望双亲的孩子，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⁴⁶赵法生始终认为，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回归民间必须采用新的言说方式——向孔子本人学习，用最生活化且直指人心的话语，用农民听得懂、喜欢听的通俗生动的话语。⁴⁷

其二，从讲师们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和志愿者们的担当意识与身体力行是乡村儒学成功的重要保证。乡村儒学缘起于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群被称为“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学者们和当地志愿者们一起，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促成了这个活动，在其后的发展中依然是靠大批志愿者的无私参与，才使乡村儒学得以持续下去。这支志愿者队伍，对乡村儒学的开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⁴⁸。参与讲学的学者们都曾受到外界以及同事、朋友甚至家人的质疑，由于他们对乡村儒学付出了很多时间、财力、精力，影响了自身的职称评定、学术研究，但学者们的应对办法是，咬住牙关，坚决顶住，在单位做好本职工作，对乡村儒学用心用力。面对社会现实，学者们虽然感到无奈和苦恼，但他们更认同的是颜炳罡的这个观点：“当前学界不缺我们这几篇学术文章，但农村却缺唤醒伦理纲常的人。去农村点燃儒学的火种，让人们的生活回归儒学，同样体现我们的价值！”⁴⁹

其三，从乡村社会的特点来看，儒学在乡村教化的成效与乡土文明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现在由于北方乡村儒学体系已经荡然无存，村民心中对于人性、人度和人伦的渴求乡村儒学能够推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孝道为切入点抓住了村民最关心的问题，以人伦道德为重点满足了村民的需求。从乡村儒学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来看，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分析的那样，乡村是个熟人社会，人们要面子，看重别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⁵⁰爱面子是一种上进心，反映了梁漱溟所说的人生向上的意愿和动力，这种上进心和荣辱感乃是乡村的熟人社会特有的精神，它将私人道德最终提升到了村庄的公共道德，是儒家教化得以发生作用的前提。如果说良知是儒家教化发

生作用的心性基础，爱面子则是儒家教化显效的社会动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才最终造就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教化景观。⁵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格局，但在现代化引发一系列道德问题的情况下仍呼唤传统文化回归，并且由于社会转型的持续性，儒学的社会心理基础依然存在，人们的情感需求、良知良心、对善恶的区别是长久存在的，因此乡村儒学能够受到村民的欢迎。

其四，从根本上说，乡村儒学的初步成效是因为儒学自身的生命力还依然存在。赵法生认为儒学原本就是人伦日用，是生活化的学问。儒学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修己安人之道。它以忠恕与内省将人领回到自己的内心，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孔孟教诲无不落实到人的心性，以开启心性作为修养历程的发端。先秦儒学是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之道，是“不可须臾离也”之道。汉儒将其政治化，宋儒将它理学化，固然有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却未免对于原始儒家的本来面目有所遮蔽。先秦儒家之道从发端于人情，《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既从人情出发，又能将人情提升到公共理性的高度，合情入理，正是儒道教化的奥秘所在。⁵²乡村儒学抓住了情感这个人伦道德的关键点，从情感入手打动人心，只要人们有情感的需求，儒学就仍具有生命力。

总之，从乡村儒学的实践效果来看，乡村儒学是可以发挥儒家教化作用的，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乡村仍然是有意义的。

四、乡村儒学的收获与瓶颈

起源于2013年的乡村儒学，只经过短短四年时间，便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归纳起来，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其一，作为一场再造乡土文明的文化实践，乡村儒学取得了初步成效，使儒学再次走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使儒学的道理再次作用于人心，正如前文所说，乡村儒学不仅树立了家庭孝道的正气，还改善了社会风气，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其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乡村儒学不但在乡村取得初步成效，还引发了社会关注，形成所谓“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并且对当地政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14年5月，山东省文化厅印发《关于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建设“尼山书院”的决定》，其中把“乡村儒学讲堂”纳入基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依托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综合文化中心）的设施设备、人员队伍、服务网络，建成一批“乡村儒学讲堂”。2014年9月，山东曲阜市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在当地的405个行政村推行“一村一名儒学讲师”计划。尽管政府推进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百姓儒学”工程与赵法生等学者一直在民间实践的“乡村儒学”在模式上有所不同，但政府的参与却让孔子故里广大农村的儒学复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三，作为一种儒学实践形态，“乡村儒学”也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乡村儒学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也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它作为“民间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儒学整体回暖的背景下，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2015年11月14—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尼山圣源书院、云深书院联合主办的“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学者，以及山东、河南、北京、河北、广东等省市的乡村儒学志愿者，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就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其四，乡村儒学的成效初步证明了，尽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很大差异，尽管遭遇现代性的冲击、处于“现代性的焦虑之下”⁶³，但发源于传统社会的儒学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价值。认识儒学的价值应当把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种评价尺度统一起来，如果只以工具价值为评价尺度，那么儒学的知识和观念均落后于时代，不能直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如果以内在价值为评价尺度，儒学则具有不因其落后时代而随之丧失的人文价值，它所提供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智慧依然蕴涵着许多值得现代社会所汲取的资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儒学能够在古代发生巨大作用是由于制度化安排的结果。从乡村儒学来看，当今儒学在道德领域仍然具有内在的人文价值，也仍然具有

发生作用的可能。

首先，儒学的道德思想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仁爱思想能够启发人积极向善，能够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能够给予人情感关怀和心灵慰藉，能够引导当代人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乡村儒学从解决最基本的家庭问题出发，从培育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做起，为当代人提供“情感启蒙”，让当代人重视到一个和谐家庭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让乡土文明重现温情脉脉的本然面目。

其次，儒学能够给当代人提供行为指导和礼仪规范，能够促进个体与群体的融洽共处，能够促进当代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儒家基于合理表达情感、节制不合理欲望的目的，建构了一套行为规范，使每个人在群体之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归属感和方向感。在当代社会，去除其中不合时代的部分，大部分仍然可以作为人们为人处世、立身行道的基本法则。乡村儒学在讲课之外，还推行基本礼仪规范的重建，从实践中证明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当代社会也依然适用，证明一套合理有序的礼仪规范对于当代人也依然有必要。

再次，儒学有助于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有助于培养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人类共同体。儒家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鼓励人们不断超越自己的现状与局限，不断追求卓越与崇高，也因此崇尚君子、贤人、圣人。儒家之所以重视“修身”，就在于自我修身能够帮助人们改善和提升自然本性，恢复伟大崇高的天地本性，使人向善成圣，成就高尚的人格，同时提醒人们作为群体之一员，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乡村儒学同样追求以高尚人格感染乡民，无私奉献的志愿讲师们就是最好的道德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最立竿见影的。

最后，儒学有助于提升当代人遵循原则、遵守规则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当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儒家认为，无论何时，做人做事都要遵循原则、遵守规则，儒家鼓励人人做君子，按照道义原则为人处世，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变化和诱惑时，要坚守原则。乡村儒学力图将儒家精神和儒学理念落实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以百姓日用中发掘出颠扑不破的义理，向乡民展示儒学

道理的恒常与普适。同时乡村儒学尽管是从家庭伦理做起，但长远目标依然是落实到社会伦理，希望与乡村自治结合起来，构建井然有序、充满活力的自治共同体。

由此可见，在当今时代，儒学依然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乡村儒学依然可以为乡民提供情感慰藉、精神指引、规范指导、人格榜样、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等等，这足以说明乡村儒学的当代意义。

不过，在取得以上收获的同时，乡村儒学的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

其一，就其理论诉求而言，前文分析了“乡村儒学”的双重诉求——既是乡村建设注入儒家文化力量，也是为儒学自身发展探索出路。这在理论上首先容易引起的质疑就是，乡村儒学的宗旨究竟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曲阜“百姓儒学”工程那样：“这项工程是农民需要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的弘扬需要农民；是社会管理需要儒学，还是农民的幸福需要儒学；是老百姓需要孔子，还是孔子学说需要老百姓？”⁵⁴即便是学者主导型的“乡村儒学”，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那么随着政府的推动和更多民间资本的注入，乡村儒学也可能从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一件既让乡民反感又使儒学再受戕害的坏事。

与之相关的质疑则是，乡村儒学力图发挥传统儒家教化作用的思路，但“教化”意味着高高在上，意味着某种道德优越感，还意味着潜在的强势灌输，在现代社会是否适用？如何避免儒家人伦大义、道德思想的缺陷和局限？且不说儒家道德思想在现代背景下需要重新辨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单说儒家教化的作用及其限度，也是令人怀疑的。重讲“老道理”，能够解决“老问题”吗？“老道理”又如何应对“新问题”？在现代社会实行儒家教化，如何解决与现代社会义理会通、兼容的问题？⁵⁵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表面的道德问题并不只是道德上出了问题，一时的道德风气改变也不只是道德教化所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只要读读经典、讲讲道理，就能重建人伦道德和社会文明，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其二，就其目前发展而言，乡村儒学面临师资严重不足、经费投入不足、教材和讲法不完善等瓶颈。比如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

长颜炳罡认为这是乡村儒学进一步展开的最大瓶颈。⁵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许多儒学专家不愿意或者不会给普通民众进行通俗讲解，另一方面不少具有强烈讲学热情的民间人士，却对儒学不够了解，在讲解中分不清儒、释、道。再如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儒学的兴起是自发的，没有专门稳定的资金来源，每一处讲堂都是通过政府、企业、民间、学者等各种方式募集资金建设的结果，并且讲师们没有任何报酬。再如教材和讲法不完善的问题，其授课内容和讲解方式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验与模式，实际上课时往往是讲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讲解，随机性较大。由于目前乡村儒学受众群体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如何发展出适合于这一受众群体的教材、教法、传播方式，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尽管对这些问题，尼山圣源书院已经在采取措施应对，比如动员更多青年学者加入讲师团队、举办讲师培训班、定期举办读书会发现讲师人才等，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⁵⁷但在短期内，这些问题将依然困扰着乡村儒学的发展。

其三，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也面临如何协调与官方关系的问题。随着乡村儒学的蓬勃发展，政府部门也积极介入，这固然是因为传统文化回归已经成为政治大气候，新一届领导层表现出了明显的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重视态度和亲近倾向，但也要对这种一时热衷保持充分的警醒。有学者提醒，乡村儒学应该扮好社会团体的角色，坚守社会运动的立场，既借助政府的力量又保持相对的独立。一方面从政府部门争得合法性地位，争得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必须与其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始终不能丢掉主导的角色，不能因为与政府的合作而失掉了自己，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只有这样，当政府部门的关注热情减去之后，才能够坚持原初的理想，能够为乡村文化的繁荣、乡村建设的发展持之有恒地发挥自身的作用。⁵⁸

五、结语

的确，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乡村儒学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强调乡村儒学的正面意义，如果不解决面临的诸多瓶颈，就难以说清楚其意义究

竟何在，也难以真正推动其持续、深入发展。

乡村儒学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当代特征、面对当代问题、应对当代需求，在继承与发展儒学跨越时空的核心精神的同时，也必须去除儒学自身的一些时代性局限，只有这样其思想价值与时代价值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否则空喊“儒学复兴”无益，妄谈“儒学重建”无益。

另外，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乡村”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山东地区取得成效的乡村儒学能否推广到其他地区？各地不同乡村是否面临类似的问题，是否可以采取类似的解决方式？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来探讨清楚。

注释：

- 1 庞景超系中国人民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双博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2016级博士研究生。
- 2 从概念上说，“乡村”并不完全等同于“农村”。“农村”是放在产业关系中来看的，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这既是沿袭古代农业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是相对于现代工业化国家而言的。而“乡村”是放在城乡关系中来看的，乡村是城市之外的人类聚居地。在经济结构上，乡村也并不只有农业，但一般来说农业是乡村的主业，其他非农产业被视为乡村的副业。另外，“乡村”这一概念承载了更多的人文气息，乡村是一种人文居所，而不仅仅是生存的场地。由于本文着眼于从城市化进程冲击乡村社会的背景来考察乡村儒学，因此主要采取“乡村”的用法。
- 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掀起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的中国农村遭遇了连续的天灾人祸，导致了一系列生态、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作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性社会运动，乡村建设运动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据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各界有识之士纷纷从不同方面对中国乡村进行建设性的改造，如晏阳初致力于乡村教育，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实验；陶行知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并创办当时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梁漱溟从全面改造乡村文化出发，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实验；黄炎培从推广职业教育出发，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乡村创办职业学校，先后在全国多地试办乡村改进试验区；彭禹廷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领导河南镇平自治，被誉为中国地方自治楷模；卢作孚注重乡村经济建设，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重

- 庆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但由于国民政府的阻挠、战争的爆发、社会改造大潮的出现，一度蔚为大观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断。
- 4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5 当前儒学的发展，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学术儒学”——也可称为“知性儒学”或“精英儒学”，是指有儒家信仰的学术精英所展开的儒学学术研究与理论创造活动，从形态上包括“经学”、“仁学”、“心性儒学”、“伦理儒学”、“艺术儒学”等等；其二，“应用儒学”——是指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当代儒学现象和实际应用到现在各领域的儒学研究，包括在政治领域应用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宪政儒学”、“法制儒学”等，在经济领域应用的“经济儒学”、“新儒商”、“管理儒学”、“工商儒学”等，在生态文明领域应用的“生态儒学”等；其三，“民间儒学”——在不同地方、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称谓，如“大众儒学”、“百姓儒学”、“生活儒学”、“乡村儒学”、“社区儒学”等，它既无清晰的理论边界，也无固定的组织，一切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活动以及对此方面的理论探索都可称为“民间儒学”。
 - 6 2015年9月27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发布《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报告》，其中第五点为“大批专家走出书斋，民间儒学蓬勃发展”。
 - 7 赵法生：《“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16（4）：107-108。
 - 8 赵法生：《“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16（4）：107-108。
 - 9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10 张玉林、桂华、干春松：《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1日。
 - 11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12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13 张玉林、桂华、干春松：《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1日。
 - 14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15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16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17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18 杭丽华：《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开发研究》，2015（3）：

27-30。

- 19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20 张玉林、桂华、干春松：《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1日。
- 21 张玉林、桂华、干春松：《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1日。
- 22 赵法生：《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专访乡村儒学发起人赵法生》，《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9月19日。
- 23 赵法生：《孔子回乡：儒学重塑乡村文明——乡村文化荒芜背景下学复兴》，《成功》，2014年12月25日。
- 24 赵法生：《礼让的、温情的乡土不见了！》，搜狐网，2017年1月26日。
- 25 赵法生：《孔子回乡：儒学重塑乡村文明——乡村文化荒芜背景下学复兴》，《成功》，2014年12月25日。
- 26 赵法生：《孔子回乡：儒学重塑乡村文明——乡村文化荒芜背景下学复兴》，《成功》，2014年12月25日。
- 27 赵法生：《关于开展乡村儒学重建的一点思考》，“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网站，2016年6月11日。
- 28 赵法生：《礼让的、温情的乡土不见了！》，搜狐网，2017年1月26日。
- 29 赵法生：《关于开展乡村儒学重建的一点思考》，“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网站，2016年6月11日。
- 30 颜炳罡，柳理：《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 乡村儒学落地需“三化”》，凤凰国学，2016年4月16日。
- 31 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网，2016年2月22日。
- 32 赵法生：《乡村儒学：播撒在乡间的文化种子》，《中国德育》，2016（1）：77-80。
- 33 苏锐：《山东建成乡村儒学讲堂逾9200个》，中国文化传媒网，2017年2月15日。
- 34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35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36 王红军：《乡村儒学：讲好“人生这本大书”》，《大众日报》，2014年11月7日。
- 37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38 鲁博林：《儒学归乡记——访山东省乡村儒学讲堂》，光明网，2014年11月19日。
- 39 杨晓卫、李俊梅：《章丘三德范村儒学讲堂，用传统文化重塑乡愁》，《中国文化报》，2015年12月23日。
- 40 王红军：《乡村儒学：讲好“人生这本大书”》，《大众日报》，2014年11月7日。
- 41 赵秋丽：《山东济宁：“儒学讲堂”遍乡村》，《光明日报》，2015年6月21日。
- 42 孙超：《乡村儒学现象研究——以山东省尼山片区为例的个案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43 袁璟：《“乡村儒学讲堂”的资源动员及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启示》，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016。
- 44 郑秋秩：《乡村儒学实验》，《北方人：悦读》，2014（12）：31-32。
- 45 张国栋：《把“大学问”讲到农民心窝里——“乡村儒学现象”采访手记之二》，《大众日报》，2014年9月14日。
- 46 鲁博林：《儒学归乡记——访山东省乡村儒学讲堂》，光明网，2014年11月19日。
- 47 段新勇：《重建乡村文明生态》，《农村大众》，2014年6月17日。
- 48 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1）：37-41。
- 49 张国栋：《迈过从书斋到乡村的坎儿——“乡村儒学现象”采访手记一》，《大众日报》，2014年9月23日。
- 50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6月第1版，第5-6页。
- 51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52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53 郑瑞萍：《乡村儒学：积跬步以至千里——关于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新东方》，2016（5）：73-76。
- 54 汪国新：《“乡村儒学”工程的喜与忧》，《成才与就业》，2014（23）：29。
- 55 杨春梅：《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儒家教化，可以和现代社会贯通吗？》，湃新闻，2015年12月18日。
- 56 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网，2016年2月22日。
- 57 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网，2016年2月22日。
- 58 李卫朝：《“乡村儒学”如何发展——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为经验教训》《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4-97。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6月第1版。
- [2] 杭丽华：《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开发研究》，2015（3）：27-30。
- [3]（李卫朝：《“乡村儒学”如何发展——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为经验教训》，《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4-97。
- [4] 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1）：37-41。
- [5] 汪国新：《“乡村儒学”工程的喜与忧》，《成才与就业》，2014（23）：29。
- [6] 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儒道研究》，2014（00）：207-220。
- [7] 赵法生：《乡村儒学：播撒在乡间的文化种子》，《中国德育》，2016（1）：77-80。

- [8] 赵法生：《“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16（4）：107-108。
- [9] 郑秋秩：《乡村儒学实验》，《北方人：悦读》，2014（12）：31-32。
- [10] 郑瑞萍：《乡村儒学：积跬步以至千里——关于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新东方》，2016（5）：73-76。
- [11] 孙超：《乡村儒学现象研究——以山东省尼山片区为例的个案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 [12] 袁璟：《“乡村儒学讲堂”的资源动员及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启示》，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6。
- [13] 段新勇：《重建乡村文明生态》，《农村大众》，2014年6月17日。
- [14] 柳河东：《乡村文明重建与儒学复兴系统工程》（《成功》访谈三），中国当代儒学网，2015年3月10日。
- [15] 鲁博林：《儒学归乡记——访山东省乡村儒学讲堂》，光明网，2014年11月19日。
- [16] 苏锐：《山东建成乡村儒学讲堂逾9200个》，中国文化传媒网，2017年2月15日。
- [17] 王红军：《乡村儒学：讲好“人生这本大书”》，《大众日报》，2014年11月7日。
- [18] 颜炳罡：《“乡村儒学”的新挑战》，人民政协网，2016年2月22日。
- [19] 杨春梅：《以〈弟子规〉为代表的儒家教化，可以和现代社会贯通吗？》，澎湃新闻，2015年12月18日。
- [20] 杨晓卫、李俊梅：《章丘三德范村儒学讲堂，用传统文化重塑乡愁》，《中国文化报》，2015年12月23日。
- [21] 张国栋：《迈过从书斋到乡村的坎儿——“乡村儒学现象”采访手记一》，《大众日报》，2014年9月23日。
- [22] 张国栋：《把“大学问”讲到农民心窝里——“乡村儒学现象”采访手记之二》，《大众日报》，2014年9月14日。
- [23] 张玉林、桂华、干春松：《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1日。
- [24] 赵法生：《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专访乡村儒学发起人赵法生》，《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9月19日。
- [25] 赵法生：《孔子回乡：儒学重塑乡村文明——乡村文化荒芜背景下学复兴》，《成功》，2014年12月25日。
- [26] 赵法生：《关于开展乡村儒学重建的一点思考》，“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网站，2016年6月11日。
- [27] 赵法生：《礼让的、温情的乡土不见了！》，搜狐网，2017年1月26日。
- [28] 赵秋丽：《山东济宁：“儒学讲堂”遍乡村》，《光明日报》，2015年6月21日。